

“人”与“鬼” 的纠葛

鲁迅小说论析

(译者) 秦三

(日本) 丸尾常喜



I210.97
36
1

“人”与“鬼” 的纠葛

——鲁迅小说论析

(日本)丸尾常喜

(译者)秦弓

343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五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据日本岩波书店 1993 年版《鲁迅：“人”“鬼”の葛藤》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与“鬼”的纠葛：鲁迅小说论析/(日)丸尾常
喜著；秦弓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12
ISBN 7-02-002238-3

I. 人… II. ①丸…②秦… III. ①鲁迅小说-研究②鲁
迅小说-评论 N. I21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2596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文物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33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定价 16.30 元



“不错，应该有一个女人，断子绝孙便没有人供一碗饭，……应该有一个女人。”（《阿 Q 正传》第四章《恋爱的悲剧》）裘沙、王伟君画鲁迅《阿 Q 正传》，岩波书店，1986 年版。



“十殿阎王”第十殿是“转轮王”。亡灵到冥府第十殿由“转轮王”决定其转生去向。“迷魂汤”是让“鬼魂”唱了便忘掉前世的一种东西。画中能看目连与被绑着的刘青提(目连之母)。据台北历史博物馆编刊《十殿阎王》(1984年)。

中译本序

我一直想通过鲁迅的文学来思索、理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而且由此在对于人的观点与对于社会、历史的理解方式诸方面也多承教泽。本书，就是这样一个日本人，当作为理解鲁迅的基础性研究，尝试搞清中国传统社会是怎样被鲁迅所把握的一个考察。

鲁迅或鲁迅的文学同我个人之间存在着两重障壁。一重是超过五十年的时间之壁。我出生于鲁迅逝世半年后。另一重是中国人与日本人的民族之壁。二者不单单民族相异，而且我们日本人从汉字开始把中国民族的文化深深地纳入自身文化的体内，与中国文化有着割不断的缘份。可是尽管如此，两种文化在重要点上还是相异的。两个民族外表上的相似性曾给我们带来了“同文同种”这一暧昧的观念，反而蒙蔽了我们的眼睛，也成为妨碍两个民族真正友好的原因。1935年，在给内山完造《活中国的姿态》所写的序文中，鲁迅这样说道：

据我看来，日本和中国的人们之间，是一定会有互相了解的时候的。新近的报章上，虽然又在竭力的说着“亲善”呀，“提携”呀，到得明年，也不知道又将说些什么话，但总而言之，现在却不是这时候。

翌年2月，鲁迅用日文写给日本人的杂文《我要骗人》，也是

用“血写”的“预感”结尾。这年10月鲁迅逝世,1937年7月爆发了日本全面侵华的日中战争。我自己就出生在这一年的3月。可是人类的历史并非单线发展的。七卷本鲁迅著作日译本《大鲁迅全集》在日本的刊行,即在1937年2月至8月。这一事情表明灵魂的交流与灵魂的隔绝二者复杂的交织与对立。

优秀的文学本来就具有拆毁性、阶级、民族、时代等阻隔人之灵魂的诸多障壁、填平隔阂的力量,而它不但能够“照见别人的心”(《域外小说集》序,1920年),并且以此给我们读者辉映出自身今日的现实状态。我们需要文学的重要缘故的确就在这里。然而尽管如此,但隔在文学与我们读者之间的这些障壁又比想象的厚。因而,我要理解鲁迅及鲁迅文学的尝试,至少要超越时间与民族这两重障壁。其方法正是从鲁迅学来的基本而朴素的方法。

世间有所谓“就事论事”的办法,现代就诗论诗,或者也可以说是无碍的罢。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题未定”草(七)》,1935年)

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只是不知成果怎样,难免内心羞愧。虽然主观上无疑不想做对不起鲁迅的事,但如“后记”中所说,我一边论及鲁迅小说中的征引与象征、寓意与化用,一边在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出中国的一句谚语——“肺肝而能言,医师面如土”。鲁迅辞世已近六十年,除了鲁迅留下的文章之外,已经不能直接聆听他的话语了。可是现在,本书由于秦弓先生的翻译,能够被鲁迅故国的读者读到了。作为阅读鲁迅著作已有三十余年的一个外国人,我自然对此感到莫大的喜悦。但同

时也伴随着极大的不安。除了研究得不够之外,我想作为异国人的盲点、执信与误解也定然不少。若能承蒙读者、研究者进行无所顾忌的批评与指教,自然是幸甚之至。

最后,对于担当翻译的秦弓先生,费神把本书介绍给出版社的吴福辉先生、朱珩青先生,在学术著作出版艰难之际很快接受本书出版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本书具体执编的王培元先生由衷地致以谢忱!

丸尾常喜

1995年1月15日在东京惠比寿原町公寓

11/9/05

目 录

中译本序	1
序 章 “人”与“人国”	1
第一章 “人”与“鬼”	
——绍兴覆盆桥周氏与其周边	6
一 “人”“鬼”的关系——祖先祭祀	6
二 “人”“鬼”的渗透——《目连戏》	19
第二章 隔绝与寂寞	
——孔乙己的后影	37
一 鲁迅与科举、科场鬼	37
二 孔乙己——起名的用意	46
三 短衣与长衫	52
四 孔乙己的后影	63
五 《白光》与“掘藏”	67
六 隔绝与寂寞	70
第三章 国民性与民俗	
——阿 Q = “阿鬼”说	84
一 序	84
二 问题的发端	94
三 “鬼”的影像	101
四 “鬼”的生态之一	112

五 “鬼”的生态之二	125
六 革命	136
七 团圆	144
八 尾声	150
第四章 祝福与救赎	
——祥林嫂的死	171
一 “呐喊”与“彷徨”	171
二 “鬼”的两义性	173
三 祥林嫂	175
四 鲁四老爷	184
五 朱安与子君	202
终 章 “人”与“鬼”的纠葛	213
后 记	226
附录一 “难见真的人!”再考	
——《狂人日记》第十二节末尾的解读	232
附录二 颓败下去的“进化论”	
——论鲁迅的《死火》与《颓败线的颤动》	251
附录三 复仇与埋葬	
——关于鲁迅的《铸剑》	291
译后记	秦 弓 315

序章 “人”与“人国”

鲁迅(本名周樟寿,后改名为树人)1881年生于浙江省绍兴。绍兴是江南的古城,古称“会稽”,因与夏禹有缘而闻名,夏禹第六代少康之子无余分封此地,故称“于越”。春秋时代为越国国都,降至南宋初期的绍兴年间(12世纪中叶),成为临时首都,以年号得名“绍兴”。鲁迅作为以明朝正德年间(16世纪初)迁居绍兴的逸斋公为始迁祖的鱼化桥周氏家族的第十四世孙,出生于被称为覆盆桥周氏的分支,可说是中等的士大夫阶层的家庭出身。

1898年,满十六岁时,他离开这一家族,告别了故乡。后来,他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S市人的脸早经看熟,如此而已,连心肝也似乎有些了然。总得寻别一类人们去,去寻为S城人所诟病的人们,无论其为畜生或魔鬼。(《琐记》,1926年)

鲁迅的离乡,同时意味着对千余年来被人视为士大夫阶层的子弟的必由之路——科举——的放弃。鲁迅这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十三经”的学习,他毅然放弃了可以作为立身之道的“十三经”的钻研成果,进而不顾向“洋鬼子”出卖灵魂的非议,选择了西洋的学问。据说,为他筹措旅费的母亲因此而哭出了声。正值戊戌变法之年,中国不变必亡的危机意识,渐渐广泛地攫住

知识分子的心灵。鲁迅的选择,也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与对自立的新生的“自我”的探索。

来到南京,鲁迅先在培养海军的江南水师学堂学习大约半年,又去培养矿山、铁路技师的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了四年,然后赴日留学。在矿路学堂,他学德语,听物理、化学、地质学等课,读严复的《天演论》。尤其是《天演论》,把进化论体系介绍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堪称一部具有纪念碑意义的著作。鲁迅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忆及最初接触《天演论》时的新鲜的喜悦,同时以其一流的谐谑概括了南京的生活:

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琐记》,1926年)

江南水师学堂是培养海军士官的学校。校内原有一个游泳池,鲁迅入学时早已填平了。因为游泳时淹死了两个学生,所以不但填平了池子,而且还在上面建起了小小的关帝庙,每年七月十五(旧历)请来一群和尚放焰口。这是因为如同后面将要触及到的,溺死者作为必定寻找替身、诱人溺死的“淹死鬼”让人害怕,为此需要用神佛之力加以镇压。

矿路学堂所经营的矿山,以薪水太贵将先前的技师辞退之后便陷于停滞状态,鲁迅三年级下矿洞实习时,只见半尺深积水的矿洞里,几个矿工像鬼一样在工作着。

鲁迅留学日本,从1902年开始约达七年半之久。海上列岛固然不是仙山琼阁,但在大约五年的热心探索、研究之后,鲁迅

始将其自身“搜”到的东西作为一种思想呈现于世。这就是1907、1908年写的一系列评论。在那篇占总论地位的《文化偏至论》(1907年)中,他这样论道:

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繆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

今敢问号称志士者曰,将以富有为文明欤,则犹太遗黎,性长居积,欧人之善贾者,莫与比伦,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将以路矿为文明欤,则五十年来非澳二洲,莫不兴铁路矿事,顾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将以众治为文明欤,则西班牙波陀牙二国,立宪且久,顾其国之情状又何如矣?若曰惟物质为文化之基也,则列机括,陈粮食,遂足以雄长天下欤?曰惟多数得是非之正也,则以一人与众禺处,其亦将木居而茅食欤?此虽妇竖,必否之矣。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而此特现象之末,本原深而难见,荣华昭而易识也。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

鲁迅思想的形成,自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国内当时围绕

着中国的救亡道路有三足鼎立的三大潮流：一是持“中体西用”论、谋求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洋务派”；二是企望通过立宪、议会来实现清朝内部改革的“变法派”；三是主张推翻清朝、实现汉民族独立、创建共和国的“革命派”。鲁迅站在“革命派”一边。在海外，他通过日本人的著作与翻译，或者邮购的德语、英语等西语文献，学习、研究欧洲的文化、思想。正是在海内外社会、文化潮流的激荡中，他形成了自己的思想。

鲁迅不能不注意到：当时欧洲社会陷入了其 19 世纪性的“偏向”，即物质崇拜而“精神”衰弱，多数统治而“个性”受压。欧洲在亚洲、非洲的“兽性”发作便与此不无关联。但克服这种“偏向”，复活并发展“精神”与“个性”的 20 世纪新思潮终于兴起了。中国因为向来轻视“精神”、排斥“个性”而招致了今日的衰退，但对世界新思潮茫然无知的“志士”们，却高叫着吸取欧洲的“偏向”。无视欧洲文化的“精髓”，而去追随其“兽性”，这只不过是一种“奴隶性”，只会招致新与旧“二重疾患”。鲁迅所“寻”到的，乃是以强大的欧洲文化为其根柢，矫正当今“偏向”的“人”。他认为，国民各个成“人”，由“人”共同创造“人国”，欲使中国生出新的生命，舍此而无他途。促使他弃医从文的，正是这种“立人”的理想。

想要“立人”的鲁迅，作为文学者最为倾心的，是被称为“恶魔派”的诗人拜伦们。他们反抗让人跪拜的“天”，拒斥跪拜于“天”的“俗”，争取“自由”与“人道”的实现。对“恶魔派”的方法，鲁迅留下了探索与变迁的轨迹，同时，“立人”的思想一直贯穿他的整个生涯。^①

辛亥革命(1911 年)与翌年中华民国的成立，实现了鲁迅们的梦想。可是中华民国其后的归趋，却是背叛了为这个共和国流血牺牲者的悲剧，使鲁迅陷入了绝望与寂寞，同时也更加强了他关于“立人”之外别无他途的确信。1918 年，标志着鲁迅重

新以文学者身份登场的《狂人日记》，揭露了中国传统社会“人吃人”的实质。小说中昭示了继续“吃人”者较之不再“吃人”的“真的人”的耻辱状态，认为在他们面前有两条路：要么悔改，要么被“真的人”除灭，二者只能择取其一。

在这一时期鲁迅的评论中，潜藏着他留学时代的英雄主义姿态，同时“人类”一词重新反复出现。前者是由辛亥革命后体验到的苦痛与沉潜所致，后者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世界各地涌起的“人道主义”潮流与“人性”的具体表露，更加使他确信“人类”“人道”的存在。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鲁迅既是民族主义者，又是人类主义者与世界主义者。

以《狂人日记》为发端的鲁迅小说，旨在描写他自己称为“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的中国民族，换言之，即作为缺乏“人”的状态而被把握的中国民族的人生的不幸与痛苦。本书就从“鬼”这一中国传统观念的象征物来考察这种“人”的匮乏状态。因此，选取他的代表作《孔乙己》（1919年）、《阿Q正传》（1921—22年）、《祝福》（1924年），其他作品亦随时言及，以求探索鲁迅的小说世界，至少要阐明其最重要的特征。

“鬼”不是日语里所说的“才二”，而是亡灵、死者的灵魂。因而，在分析鲁迅作品之前，有必要搞清楚在中国传统社会“鬼”是怎样的东西，人与“鬼”在那里结成怎样的关系。下面就从探索它们在鲁迅的家族及其周边的存在状态开始。

注 释：

① 参照王得后《鲁迅与中国文化精神》（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其他同类的观点，还见之于鲍晶《鲁迅早期的“立人”思想》、王锦泉《从“立人”到“立国”——鲁迅改革国民性思想探讨》（均收鲍晶编《鲁迅“国民性思想”讨论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等。

第一章 “人”与“鬼”

——绍兴覆盆桥周氏与其周边

一 “人”“鬼”的关系——祖先祭祀

“人”死皆成“鬼”。虽然“鬼”的一部分，譬如孔子、老子等圣贤，关羽、岳飞等英雄之“鬼”成为“神”，但“人”死变“鬼”这件事则没有不同。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鬼”与日本所说的“才二”有别，是人死后的存在。鲁迅的二弟周作人这样说道：

我觉得中国民众的感情与思想集中于鬼，日本则集中于神，故欲了解中国须得研究礼俗，了解日本须得研究宗教。（《我的杂学》十四，1944年）

“鬼”的观念是单单属于礼俗的范畴还是怎样，这个问题留待后面再来探讨。周作人认为，要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与思想，必须研究“鬼”。这个意见值得听取。

那么，“鬼”的实体究竟是什么呢？实际上，这一观念有各种各样的层面。正如后面所要言及的那样，儒家重视对于“鬼”的祭祀，但孔子把那应该祭祀的“鬼”限定为自己的祖先之“鬼”，对于祖灵以外的“鬼”的祭祀则视为“谄”而加以排斥。而且，关于“鬼”的实体，他什么也没说。荀子则明确地否定作为实体的“鬼”的存在。但他也重视对祖先的祭祀。即使同在儒教门下，

对于“鬼”的见解亦因人因时而有各种各样，再加上道教、佛教思想的渗透，“鬼”的观念呈现出复杂的情况。

在清末的绍兴及鲁迅的故家，人们持有怎样的“鬼”的观念，“人”与“鬼”结成怎样的关系，这里想把这一问题作为中心予以考察。在此之前，如果参考关于直到最近仍较好地保留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习俗、礼仪的台湾汉族社会的实地调查报告，将中国传统社会末期民间的“鬼”的基本观念做一简单的整理，其概要大致如下^①。

“灵魂”这种东西是存在的。它在“阳间”（“明界”）宿于并支配“人”的身体，“人”一死则离开其身体进入“阴间”（“幽界”），构成一个世界。“人”在“阳间”，“鬼”在“阴间”，二者是灵魂在不同场所的存在形式。只是重要的在于，“阴间”的“鬼”的“生活”（鲁迅的杂文《死》〔1936年〕里用过这一语汇）要依赖他们的子孙从“阳间”供奉，诸如食物、衣服（“纸衣”）、金钱（“纸钱”）等。在这种观念下，祖先祭祀即意味着把这些东西呈送给祖先之“鬼”。因此，没有后嗣，就不能获得祭祀，这样的“鬼”在“阴间”就得过着悲惨的“生活”。这种“鬼”特称“孤魂”，因其腹中空空的形象也叫“饿鬼”。

这些“孤魂”在“阴间”得不到安定的生活，所以夜间离开“阴间”，出没于“阳间”，与其他“亡魂”（夭折者之“鬼”）、“怨魂”（死于不测者之“鬼”）、“冤魂”（含冤受戮者之“鬼”）等一起成为“野鬼”（“游魂”），在空中流浪，给村里带来疾病与灾祸。因此，要举行镇抚它们的各种礼仪。

总之，存在着两种“鬼”。一种是得到子孙安定的祭祀的“鬼”，即使为“鬼”，但作为对子孙供养的回报，它要保佑“阳间”的子孙的生活，因而具有与“神”相近的品格。实际上，人们对于祖灵回避称之为“鬼”，而一般地叫“家亲”、“祖公”、“神”。另一